

卷一 先秦典籍

1. 尚 书

《尚书》，是儒家经典之一。它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记录古代历史文献和追述古代史迹的资料汇编，保存了虞、夏、商、周各代的部分诰言、誓辞和史事。此书原先仅称为《书》，战国时代被儒家尊奉为“经”，大约西汉初年，学者们以为此书为上古之书，故又称其为《尚书》。

西汉时期，学者们认为《尚书》系孔子编纂而成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说：“孔子之时，周室微而礼乐废，《诗》《书》阙。至追述三代之礼，序《书传》，上纪唐虞之际，下至秦缪，编次其事。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说：“《书》之所起远矣，至孔子纂焉。上断于尧，下迄于秦，凡百篇，而为之序，言其作意。”但自宋代以来，此说受到了学者们的怀疑。后世学者或仍持汉人之说，或认为其中有些篇章成于战国时代，不可能由孔子编入，此书既非成于一时，也非出自一人之手，而是经长期汇集流传，至战国时期才最后定型。

《尚书》又称《书经》，但《尚书》一名要比《书经》之名通行得早，沿用的时间也最长。关于书名的意义，汉代学者主要有三种观点。明代人孙穀在《古微书》卷四引《尚书璇玑铃》中说：“尚者，上也；书者，如也。上天垂文，象布节度。

书也，如天行也。一作上天垂文，以布节度，如天行也。书务以天言之，因而谓之书，如尚以尊之。”《尚书正义》引郑玄《书赞》说：“尚者，上也。尊而重之，若天书然。”认为，《尚书》是尊重的意思。《尚书正义·书序》引马融《尚书传序》曰：“上古有虞氏之书，故曰《尚书》。”认为，《尚书》是上古之书。王充《论衡·正说篇》中言：“《尚书》者，以为上古帝王之书，或以为上所为，下所书。”其中《须颂篇》中又言：“‘或问《尚书》？’曰：‘尚者，上也。上所为，下所书也。’‘下者谁也？’曰：‘臣子也。’然则臣子书上所为矣。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说：“古之王者世有史官，君举必书，所以慎言行、昭法式也。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，事为《春秋》，言为《尚书》。”《尚书正义·书序》引王肃曰：“上所言，史所书，故言《尚书》。”认为，《尚书》即是帝王所为，而臣下所书。概括而言，《尚书》的含义，还是以其为上古之书、由臣官所记比较合理。

《尚书》原来共有多少篇，已经无从考知。传说其篇目原有 3000 多篇，后经孔子整理，仅保留 100 篇。关于孔子整理《尚书》之事，除了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有记载外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也说：“《书》之所兴，盖与文字俱起。孔子观书周室，得虞、夏、商、周四代之典，删其善者，上自虞，下至周，为百篇，编而序之。”孔子是中国春秋时期伟大的教育家，是最早将贵族文化向平民阶层普及的大学者，他删《诗》《书》，订《礼》《乐》，赞《易》道，修《春秋》，以此作为教授生徒的教材，这在历代史书中多有记载。故《尚书》的编定，孔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
汉代时，《尚书》在经历了秦代的焚书浩劫之后，所剩篇目已经不多。《史记·伏生传》中说：“伏生者，济南人也，故为秦博士。秦时焚书，伏生壁藏之。其后兵大起，流亡。

定，伏生求其书，亡数十篇。独得二十九篇。即以教于齐鲁之间。学者由是颇能言《尚书》。”伏生在传授《尚书》时，教授了弟子济南张生、欧阳生，欧阳生再教授倪宽。汉文帝时，欲求能治《尚书》之人，天下无有，后闻伏生能治《尚书》，欲召之来京师，但这时伏生已年 90 余，老不能行，于是朝廷派太常使晁错前去受学。这 29 篇由于是以汉代通行的隶书写于竹简，故称之为《今文尚书》，后得立于学官。其篇目包括：《尧典》《皋陶谟》《禹贡》《甘誓》《汤誓》《盘庚》《高宗彤日》《西伯戡黎》《微子》《大誓》《牧誓》《洪范》《金縢》《大诰》《康诰》《酒诰》《梓材》《召诰》《洛诰》《多士》《无逸》《君奭》《多方》《立政》《顾命》《费誓》《吕刑》《文侯之命》《秦誓》。由于此书来自伏生，故伏生被推为今文《尚书》之祖。

但是，汉代除了《今文尚书》之外，还有《古文尚书》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说：“《古文尚书》者，出孔子壁中。武帝末，鲁共王坏孔子宅，欲以广其宫，而得《古文尚书》及《礼记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，凡数十篇，皆古字也。共王往入其宅，闻鼓琴瑟钟磬之音，于是惧，乃止不坏。孔安国者，孔子后也，悉得其书，以考二十九篇，得多十六篇。安国献之，遭巫蛊事，未列于学官。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、大小夏侯三家经文，《酒诰》脱简一，《召诰》脱简二。率二十五字者，脱亦二十五字；简二十二字者，脱亦二十二字；文字异者七百有余，脱字数十。”此次于孔壁中发现的《尚书》，共有 45 篇。除了与《今文尚书》相同的 29 篇外，还多出 16 篇。据《尚书·尧典·正义》引郑玄《书序·注》，这 16 篇的篇目包括：《舜典》《汨作》《九共》《大禹谟》《益稷》（当作《弃稷》）《五子之歌》《胤征》《汤诰》《咸有一德》《典宝》《伊训》《肆命》《原命》《武成》《旅獒》《罔命》（当作《毕命》）。《古文尚书》自孔安国而后，长时间是以私学形式递相传授。司马迁曾从孔安国习

《古文尚书》，《史记》中多载《古文尚书》的篇目和内文。这样，汉代《尚书》经学的传授中，出现了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两个学派。西汉时代，《今文尚书》学派在政治和学术领域中，占据了主导地位。

东汉时代，杜林精于古文经学，他把《古文尚书》传授给了卫宏、徐巡，开后来贾逵、马融传古文的系统。贾逵传许慎，许慎著《说文解字》，其书多引用《古文尚书》。东汉末年，马融传古文经学于郑玄和卢植等人，他们对于《尚书》的研究，逐渐融合了今、古文经的界限，而《尚书》古文经学也占据了此学的中心地位。魏正始年间（240—248），由于《古文尚书》学派在政治和学术领域中，占据了绝对的权威地位，因而此经被刻成石经，称为“魏石经”，“正始石经”或“三体石经”。至此，学者们在《尚书》的研究中，大多以《古文尚书》为中心。

西晋的永嘉之乱，导致了《尚书》今、古文的散失，所刻的石经也遭到了破坏。后来，东晋梅賾献了一部《古文尚书》，书前加有一篇孔安国的序，书中经文各句之下又加有孔安国的传注，称此书是孔安国所传的《古文尚书》。由于朝廷的提倡，此书得以立于学官，这样这部加有孔安国传的《古文尚书》，取得了《书经》的正统地位，并一直流传下来。唐代孔颖达奉诏作《尚书正义》，也是以此书为据而写成。南宋时，又把孔安国《传》与孔颖达《正义》，合刻而成《尚书注疏》。到了明清两代，又把《尚书注疏》汇刻于《十三经注疏》中。然而，梅賾所献的《古文尚书》及孔安国《传》却是伪作。

今存《尚书》中的《今文尚书》史料，基本上可用。而伪《古文尚书》由于是后人伪造，故其史料不可信，但其中保存了前人的一些注解，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。《今文尚书》 29 篇，其内容涉及中国远古至周代历史时期的政治、军事、法

律、天文、地理等方面史实。作为一部记言体的史书，它记述了虞、夏、商、周 4 个不同时代的国家大事、战争讨伐宣言、政府文告、名臣言论等。这些材料对于考察上古社会政治制度的沿革，以及文化思想的演变，具有着重要的作用。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认识，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发展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历代以来，对于《尚书》的注解，著作众多，观点各异，成为中国传统经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。就经学学派而言，则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别；就经学注解而言，则有偏重训诂的汉学和偏重义理的宋学之分。汉代的《尚书》注解，现已大部分散佚，清代学者对此作了一些辑佚工作。宋代以后的注解，则多保存了下来。现存的《尚书》注解和版本，主要有：《尚书注疏》20 卷，唐孔颖达疏，唐陆德明释，有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《四库全书》本等。《书经集传》6 卷，宋蔡沈撰，有《四库全书》本等。《尚书全解》40 卷，宋林之奇撰，有《四库全书》本。《尚书集注音疏》12 卷，清江声撰，有《皇清经解》本。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30 卷，清孙星衍撰，有《平津馆丛书》本，1986 年中华书局排印本等。《今文尚书经统考》33 卷，清陈乔撰，有《皇清经解续编》本，《左海续集》本。《尚书古文疏证》8 卷，清阎若璩撰，有《四库全书》本等。《古文尚书考》2 卷，清惠栋撰，有清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）刻本。《尚书通论》，陈崇家著，有 1957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。《尚书正误》，曾远乾著，有 1964 年中华书局排印本等。

2. 诗 经

《诗经》，是儒家经典之一，它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，记录了西周至春秋时代的部分诗歌。是书原只称《诗》，

至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，始称为《诗经》。

《诗经》一书的形成，有着悠久的历史。书中诗歌的来源，主要有 3 个方面：一是汉代有人认为，周初国家为了考察风俗好坏、政治得失，专门设有采诗的官，负责采集流传在民间或出于士大夫的诗歌，然后献给乐官；二是王朝的贵族为了充实音乐，祭祀鬼神，夸耀功业或别种目的，将作成的诗歌也交给乐官；三是诸侯各国为了尊重王朝，交换音乐，也派人将诗歌献给乐官。这样，《诗经》就是由周王朝各个时期的乐官编辑整理而成的。它上迄西周初年，经过 500 多年，至春秋中叶完成，是周代前 500 多年间诗歌的选录，其篇目原来大约有 3000 多首。

春秋末期，儒学创始人孔子，为了教育学生，曾将《诗》加以删订、整理，而成 300 余篇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说：“古者《诗》三千余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可施于礼义，上采契、后稷，中述殷、周之盛，至幽、厉之缺，始于衽席，故曰：‘《关雎》之乱以为《风》始，《鹿鸣》为《小雅》始，《文王》为《大雅》始，《清庙》为《颂》始。’三百五篇，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《韶》《武》《雅》《颂》之音。”《论语·子罕》中载孔子言：“吾自卫返鲁，然后乐正，雅颂各得其所。”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说：“孔子纯取周诗，上采殷，下取鲁，凡三百五篇。”《诗经》一书，是经孔子加以删订纂定而成，对此孔子自己也曾说过。所以，历代学者大多赞同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的观点。孔颖达在《毛诗正义序》中说，《诗》“时经五代，篇有三千。成、康没而颂声寢；陈灵兴而变风息。先君宣父厘正遗文，缉其精华，褫其烦重，上从周始，下迄鲁僖，四百年间，六诗备矣。”朱熹在《诗集传序》中也说：“孔子生于其时，既不得位，无以行劝惩黜陟之政，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。去其重复，正其纷乱，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、恶之不足以

为戒者，则亦刊而去之，以从简约，示久远，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，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。”由此可见，孔子在《诗经》一书的形成和传播中，具有着重要的作用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《诗经》一书，在经历秦始皇焚书劫难之后，到了西汉初年，其篇目只剩下了 305 篇。当时，传授《诗经》的有 4 家：鲁人申培所传的称《鲁诗》，齐人轅固所传的称《齐诗》，燕人韩婴所传的称《韩诗》，鲁人毛亨所传的称《毛诗》。鲁、齐、韩 3 家的传本经文，皆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，统称为“今文诗”，汉初得立于学官。毛亨的传本经文，原用先秦古文写成，故称为“古文诗”。4 家经文小有不同，而解说则多有歧异，今文家和古文家的歧异则更甚。后来，鲁诗亡于晋朝的东渡，齐诗亡于曹魏，韩诗亡于宋朝的南渡，惟有《毛诗》独传，所以《诗经》也被称为《毛诗》。

今存《毛诗》即《诗经》，东汉末郑玄作《笺》，唐孔颖达作《正义》，凡 40 卷，305 篇，分为风、雅、颂三类。风的篇目包括《周南》《召南》《邶》《鄘》《卫》《王》《郑》《齐》《魏》《唐》《秦》《陈》《桧》《曹》《豳》15 国风，共 116 篇，多数为民间歌谣。雅有《小雅》和《大雅》，也叫《大夏》和《小夏》，合称二《雅》，其中《小雅》74 篇，《大雅》31 篇，二者共 105 篇，皆为西周王畿的诗歌，其内容多为西周时代的作品。颂有《周颂》《鲁颂》《商颂》，合称三颂，其中《周颂》31 篇，《鲁颂》4 篇，《商颂》5 篇，共 40 篇，大体为西周和鲁国、宋国的最高统治者用于祭祀或其他重大典礼的乐歌，其内容在于赞美在位的周王、鲁侯、宋公或其祖先的功德。总之，风雅颂的区别在于，风是民间歌谣，但也有些例外；雅是朝廷官吏的作品，而《小雅》又有些民间歌谣；颂是王侯举行祭祀或其他重大典礼专用的乐歌。三者的界限并不严格。关于风、

雅、颂三者的含义，《荀子·儒效篇》中说：“《风》之所以为不逐者，取是以节之也；《小雅》之所以为小雅者，取是而文之也；《大雅》之所以为大雅者，取是而光之也；《颂》之所以为至者，取是而通之也。天下之道毕是矣。”荀子认为，《诗经》一书，阐发了天下之至理或大道。

由于自孔子之时起，《诗经》就受到了儒家的高度重视，并作为教授生徒的教材，故孔子和儒家所阐发的“诗”教思想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着重要的影响。《论语》中记载了孔子对于《诗》教的重视和提倡。《为政》篇中载，孔子曰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‘思无邪。’”《泰伯》篇中载，孔子说：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”《季氏》篇中载，孔子说：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。”《阳货》篇中载，孔子说：“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？诗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又说：“女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矣乎？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，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？”孔子认为，学习《诗》是获取知识、修养道德的重要途径。此外，《礼记·乐记》中记载，师乙在回答子贡问乐时说：“宽而静，柔而正者宜歌《颂》；广大而静，疏达而信者，宜歌《大雅》；恭俭而好礼者，宜歌《小雅》；正直而静，廉而谦者，宜歌《风》。”《周礼·大师》中说：“教六诗：曰风、曰赋、曰比、曰兴、曰雅、曰颂，以六德为之本，以六律为之音。”对此，郑玄在注中说：“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也；赋之言铺，直铺陈今政教善恶；比，见今之失，不敢斥言，取比类以言之；兴，见今之美，嫌于媚谀，取善事以喻劝之；雅，正也，言今之正者，以为后世法；颂之言诵也，容也，颂今之德广以美之。”关于《诗》教的六义，风、雅、颂三者，指的是诗的体裁；而赋、比、兴三者，指的是诗的作法。孔颖达在《毛诗正义》卷一中也说：“赋者，直陈其事，无所避讳，故得

失俱言；比者，比托于物，不敢正言，似有所畏惧，故云见今之失，取比类以言之；兴者，兴起志意赞扬之辞，故云见今之美，以喻劝之。”这实质上体现了儒家对于《诗经》内容及大旨的认识。

《诗经》里的作品，上迄西周初年，下至春秋中叶，地域包括了现在的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及甘肃的南部，代表了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，反映了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当时社会的典章制度、风俗习惯、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情况，保存了丰富的社会历史资料，具有着很高的历史价值。

历代以来，对《诗经》加以注释的学者及著作众多，其中主要的著作有：《毛诗注》20卷，毛亨传，郑玄笺，有《袖珍十三经注》本等；《毛诗正义》40卷，毛亨传，郑玄笺，陆明德音义，孔颖达疏，有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《四库全书》本，《四部备要》本等；《诗本义》15卷，欧阳修撰，有《通志堂经解》本，《四部丛刊》本，《四库全书》本等；《诗集传》8卷，朱熹撰，有《四库全书》本等；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32卷，吕祖谦撰，有《四库全书》本，《四部丛刊》本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等；《诗毛氏传疏》30卷，陈奂撰，有《皇清经解续编》本等；《诗古微》17卷，魏源撰，有《皇清经解续编》本等；《诗经今注》，高亨注，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本。

3. 春 秋

《春秋》，儒家经典之一，先秦鲁国的一部编年史著作。由孔子所修订而成。

关于书的书名含义，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引晋杜预《春秋序》中说：“《春秋》者，鲁史记之名也。记事者，以事系日，以日系月，以月系时，以时系年，所以记远近、别同异也。故

史之所记，必表年以首事，年有四时，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。”他认为，《春秋》之意，即在于以“春秋”代四时，并记录所发生的历史事件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又说：“古之王者，世有史官。君举必书，所以慎言行、昭法式也。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。事为春秋，言为尚书，帝王靡不同之。”所以，“春秋”即是记录发生的历史事实。《春秋》之名，原本并非鲁史专用，只因各国《春秋》早亡，故一提《春秋》，学者们即知其是指鲁史。

《春秋》一书，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（前 772），止于鲁哀公十四年（前 481），总共记述了 242 年的史实。《春秋》之所以止于鲁哀公十四年，这里还有一个“获麟绝笔”故事。鲁哀公十四年（前 481）春天，鲁国贵族“西狩获麟”，麟在当时被认为是瑞兽，是圣人出现的象征。但此时却是礼坏乐崩的时代，又无圣人降临，故孔子触景生情，悲叹道：“吾道穷矣。”^①见到麟后，他就结束了其所编修的《春秋》。

关于孔子编修《春秋》一事，史载中多有记载，学者们也大多认同。最早提及此事的是孟子。《孟子·离娄下》中载，孟子说：“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，《诗》亡，然后《春秋》作。晋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檮杌》，鲁之《春秋》，一也。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。孔子曰：‘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。’”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也载：“世衰道微，邪说暴行有作。孔子惧，作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。是故孔子曰：‘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！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！’”，同篇又载，“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，周公兼夷狄、驱猛兽而百姓宁。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”孟子不仅充分肯定了孔子曾经编修《春秋》，而且称颂其功绩等同于夏禹、周公。汉代董仲舒也言孔子作

① 《春秋公羊传》哀公十四年。

《春秋》,其在《春秋繁露·俞序》篇中说:“仲尼之作《春秋》也,上探正天,端王公之位,万民之所欲;下明得失,起贤才以待后圣。故引史记,理往事,正是非。”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也多次提到孔子作《春秋》,其《太史公自序》中说:“余闻董生曰:‘周道衰废,孔子为司寇,诸侯害之,大夫壅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,道之不行也。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以为天下仪表。贬天子,退诸侯,讨大夫,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:‘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夫《春秋》上明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纪,别嫌疑,明是非,定犹豫,善善恶恶,贤贤贱不肖,存亡国,继绝世,补敝起废,王道之大者也。……拨乱世,反之正,莫近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文成数万,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皆在《春秋》。”《十二诸侯年表》中也说,孔子“故西观周室,论史记旧闻,兴于鲁而次《春秋》,上记隐,下至哀之获麟,约其辞文,去其烦重,以制义法。王道备,人道浹。七十子之徒,口授其传指,为有所刺讥,褒讳、挹损之文辞,不可书见也”;另外,《孔子世家》中又称,孔子“病歿世而名不称焉,吾道不行矣,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,乃因史记作《春秋》”;至于《春秋》,笔则笔,削则削,子夏子徒不能赞一辞。弟子受《春秋》,孔子曰:‘后世知丘者以《春秋》,而罪丘者亦以《春秋》’。”汉代以后,学者们对于孔子作《春秋》一事,大多予以承认和称赞。

孔子在修订《春秋》时,叙事极为简约,以用字而寓褒贬,后世称这种写法为“春秋笔法”,也称为“微言大义”。皮锡瑞在《经学通论·春秋》中说:“《春秋》有大义,有微言。所谓大义者,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;所谓微言者,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。”东晋范宁在《穀梁传序》中也说:“一字之褒,宠逾华衮之赠;片言之贬,辱过市朝之撻。德之所助,虽贱必申;义之所抑,虽贵必屈。故附势匿非者,无所逃其罪;

潜德独运者，无所隐其名。信不易之宏轨，百王之通典也。”可见，学者们认为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并不仅仅在于记载鲁国的史事，而是在于为后世制法。所以，皮锡瑞《经学通论·春秋》中指出：“须知孔子所作者，是为万世作经，不是为一大作史。经史体例所以异者，史是据事直书，不立褒贬，是非自见；经是必借褒贬是非，以定制立法，为百王不易之常经。”

《春秋》作为儒家经典，其后传释《春秋》经者有多家，著名的为《左氏》《公羊》和《穀梁》等三家传。其中，《左传》为古文经学派，其传注《春秋》的特点在于以史实疏通之；而《公羊》和《穀梁》则属于今文经学派，其传注的特点在于着重阐发《春秋》中的义理。关于这三传的特点，东晋范宁《穀梁传序》中说：“《左氏》艳而富，其失也巫；《穀梁》清而婉，其失也短；《公羊》辩而裁，其失也俗。若能富而不巫，清而不短，裁而不俗，则深于其道者也。”这一说法，尚较公允。

《春秋》经传，在中国经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历代以来，注解《春秋》经传的学者和著作非常多。比较著名的有：《春秋经传集解》30卷，晋杜预撰，《四部丛刊》本，《四部备要》本等；《春秋左传正义》60卷，杜预注，唐孔颖达疏，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《四部备要》本等；《春秋左传注》，杨伯峻注，中华书局本；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12卷，汉何休撰，《四部丛刊》本等；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28卷，何休注，徐彦疏，并附陆德明《释文》《十三经注疏》本等；《春秋穀梁注疏》20卷，范宁集解，杨士勋疏，陆德明音义，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《四部备要》本等。

4. 论 语

《论语》，是儒家经典之中最为著名的一部著作，它是孔子及其部分弟子的言行记录的汇编。现今流传下来的《论语》，全书内容共计 20 篇，分别为：《学而》《为政》《八佾》《里仁》《公冶长》《雍也》《述而》《泰伯》《子罕》《乡党》《先进》《颜渊》《子路》《宪问》《卫灵公》《季氏》《阳货》《微子》《子张》《尧曰》。

《论语》一书，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。但是，对于这部书的书名、作者、成书年代以及内容真伪等问题，自汉代以至现在，学者们却有着不同的观点。

关于书名的由来问题，在历史上则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。第一种观点，认为《论语》是因编辑论纂而得名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“《论语》者，孔子应答弟子时人，及弟子相与言，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。当时弟子各有所记，夫子既卒，门人相与辑而论纂，故谓之《论语》。”据《文选·辨命论》注引，晋代傅玄在其著作《傅子》中，也重申了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观点，他说：“昔仲尼既殁，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，谓之《论语》。”唐代陆德明在《经典释文》中也说：“夫子既终，微言已绝。弟子恐离居已后，各生异见，而圣言永灭。故相与论撰，因辑时贤及古明王之说，合成一法，谓之《论语》。”康有为在其著作《新学伪经考》卷 3 “汉志《论语》类辨伪”中说：“夫子既卒，门人相与辑而论纂，故谓之《论语》。”杨伯峻在其所著《论语译注·导言》中，则进一步说：“（1）《论语》的‘论’是‘论纂’的意思，《论语》的‘语’是‘语言’的意思，《论语》就是把‘接闻于夫子之语’，‘论纂’起来的意思。（2）《论语》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，不是后来别人给它

的。”第二种观点，认为《论语》书名来源于有条理的论述自己的话。汉代刘熙在其《释名·释典艺》中说：“《论语》，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。论，伦也，有伦理也。语，叙也，叙己所欲叙说也。”他认为，《论语》就是有条理的叙述孔子自己的话。第三种观点，则认为《论语》书名，是来自内容为孔子遗言而被后来诸儒讨论。元代何异孙在其《十一经问对》中说：“《论语》有弟子记夫子之言者，有夫子答弟子问者，有弟子自相答者，又有时人相言者，有臣对君问者，有师弟子对大夫之问者，皆所以讨论文义，故谓之《论语》。”清代赵翼在其《陔余丛考》卷4“公山弗扰召孔子不可信”一文中，指出：“战国及汉初人书所载孔子遗言、轶事甚多，《论语》所记，本亦同此记载之类，齐鲁诸儒讨论而言，始谓之《论语》。语者，圣人之遗言，论者诸儒之讨论也。”这种观点认为，《论语》即是讨论文义的书。就这三种观点而言，第一种观点也即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说法，概括得比较全面，符合《论语》一书的具体内容特点。所以，《论语》一书的内容，不仅记载了孔子应答弟子和时人之间的话，还记载了孔子弟子与孔子的对话以及弟子们之间的对话，同时也记载了弟子们复述他们间接听到孔子所说的话。故梁皇侃在《论语义疏叙》中说：“《论语》者，是孔子歿后，七十弟子之门徒，共所撰录也。……皆夫子平生应机作教，事无常准，或与时君抗厉，或共弟子抑扬，或自显示物，或混迹齐凡，问同答异，言近意深。《诗》《书》互错综，《典》《诰》相纷纭，义既不定于一方，名故难求乎诸类，因题《论语》两字，以为此书之名也。”

《论语》书名何时而确定下来，人们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。就是书的内容而言，书名的形成当在孔子卒后成书时就用此名。然而，东汉时代的王充却认为，书名确定于汉武帝时代的孔安国。他在《论衡·正说篇》中说：“初，孔子孙孔安国以教

鲁人扶卿，官至州刺史，始曰《论语》。”但是，王充自己也曾承认《论语》一书，早在汉武帝之前就有传授。此外，《礼记·坊记》中也曾引证过《论语》文字，书中说：“子云：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。《论语》曰：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’”虽然《礼记·坊记》的著作年代目前尚不能确定，但它一定在汉武帝之前。所以，这一说法并不可靠。

关于《论语》一书的作者和编纂年代，也有不同的观点。汉代刘向《别录》认为，是书是由孔子弟子所记而成；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认为，是书孔子弟子各有所记，门人辑而成书；东汉赵岐《孟子题辞》认为：“七十子之畴，会集夫子所言，以为《论语》。”东汉郑玄认为，是书是由孔子弟子仲弓、子游、子夏等撰定。唐代柳宗元认为，是书最终是由曾参弟子所撰定。北宋二程（颢、颐）则认为，是书是由有若、曾参的门人所编成，因为书中独对有若、曾参尊称为子，其余孔子弟子则直呼其名。统观《论语》一书的内容，以及学者们的观点，关于是书的作者，还是以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说法为好，统称为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所编纂而成。由于《论语》一书不是一人一时所编定，而是经过了多年并由多人编写而成，所以，就它的成书时间而言，其著笔则当始于春秋末期孔子卒后的公元前 479 年，而编纂成书则当在战国初期子思卒后的公元前 400 年。

关于《论语》的版本演变及内容的真伪问题，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。《论语》传到汉代，由于传授《论语》的学者不同，故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版本。一是《鲁论语》，共有 20 篇；二是《齐论语》则为 22 篇，其中 20 篇的章句有很多和《鲁论语》相同，但多出了《问王》和《知道》两篇；三是源出孔壁的《古文论语》则为 21 篇，没有《问王》和《知道》两篇，但是把《尧曰》的“子张问”另分为一篇，篇次与《鲁论语》和

《齐论语》不同，文字不同者则有 400 多字。《鲁论语》和《齐论语》最初各有师传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说：“汉兴，有齐、鲁之说。传齐《论》者，昌邑中尉王吉、少府宋畸、御史大夫贡禹、尚书令五鹿充宗、胶东庸生，惟王阳名家。传鲁《论语》者，常山都尉龚奋、长信少府夏侯胜、丞相韦贤、鲁扶卿、前将军萧望之、安昌侯张禹，皆名家。张氏最后，而行于世。”西汉末年，张侯曾为汉成帝的师傅，后又为丞相 6 年，封安昌侯，当时极为尊贵。他先从夏侯建受《鲁论语》，又从庸生、王吉受《齐论语》。后来，他以《鲁论语》为基础，兼参考《齐论语》，将这两种版本合二为一，称《张侯论》。这一版本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，东汉灵帝时所刻的《熹平石经》用的就是这一版本。《古文论语》是在西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壁中发现的，当时没有传授。何晏在《论语集解序》中说：“《古论》惟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，而世不传。”孔安国是孔子第十一代孙，汉武帝时为博士，鲁恭王坏孔子旧宅，从墙壁中得到古文《尚书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等，后又悉还孔氏，故安国承诏作《书》传，又作古文《孝经》，亦作《论语》训解。由于汉武帝末年遭遇巫蛊事件，孔安国所作的训解竟告失传，但《古文论语》被保存下来。东汉末年，经学大师郑玄以《张侯论》为依据，参照《齐论》和《古论》，作了《论语注》，但其注今已残阙。今天通用的《论语》，基本上就是《张侯论》。

《论语》内容的真伪，也是儒家经学中论争的一个问题。后人认为《古文论语》是刘歆伪造的，进而非议张禹不应把鲁、齐两个版本合二为一。有的学者认为，《论语》中的许多内容是不可信的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清代的经学家崔述，他在《洙泗考信录》中认为，《论语》的前 15 篇基本可信，但《雍也》《先进》《乡党》等篇中也不无可疑之处，而后 5 篇

《季氏》《微子》《阳货》《子张》《尧曰》中，则有许多章是不可靠的。但是，崔述生活的乾嘉时代，整个学术界中存在着疑古之风，崔述也受到了这种学风的影响，所以他的观点并不能令人信服。所以，《论语》一书，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最直接、最可靠的经典资料。

《论语》作为记载孔子思想的代表著作，它的内容主要包括修身和治国两大方面，这两方面的内容彼此融合、相互关联，并以孔子的仁道思想而一以贯之。孔子生当春秋末年，当时正是中国社会和文化出现重大变革的转型时期。面对着“天下无道”、“礼坏乐崩”的动荡局面，目睹着“世衰道微”、“杀人盈野”的残酷现实，孔子在对历史文化的反思认识中，“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”，创立了以修身齐家为核心的儒家学说。孔子的修身治国仁道思想，探讨的是如何建构人文社会的合理运行秩序，思索的是怎样成就人伦之至的圣人德业，他不语超越人生的怪力乱神，亦不言脱离现实的幽冥世界。

孔子的仁道思想，其核心是“爱人”。“樊迟问仁，子曰：爱人。”爱人的仁道是指个体在符合自身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规范的前提下，推己及人泛爱人类的一种朴素人道主义，它包括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恭、宽、惠、敏、毅等诸德。爱人的仁道则具体表现为忠恕之道，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”忠即是尽己之心力以助人，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。自己想成就完善自身的道德和功业，也要使他人成就完善自身的道德和功业。这是仁道实践的积极形式。恕即是不把己之所恶施加于他人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自己不想得到的事物，也不要施加于他人。这是仁道实践的消极形式。忠恕之道作为孔子爱人仁道的核心内涵，是成就仁礼道德，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方法，它不仅重视个体生存的价值完善，而且重视社会存在的价值完善。